

許紫芬，《近代中國商人的經營與帳簿：長崎華商經營史的研究》，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5年，273頁。

長期以來，商業史上存在着一種普遍共識，那就是認為中國商人沒有發展出複式簿記。這種論調尤其以潘序倫為代表，潘氏在《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中稱：「我國舊式商家所應用之記帳方法，多近似單式簿記。其所以不用雙式簿記者，非因雙式簿記之記賬手續，如何繁複，如何艱深，實因主持會計者，相沿成習，不知雙式簿記為何物耳。」（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2009，頁5）

大體而言，學界對於中國傳統簿記的研究甚少，主要是因為：舊式商人對於經營資料視為商業秘密，致使完整的可供研究的帳簿資料難尋；在近代會計制度普及之前，各商號內部的記帳方法大多自成體系，師徒相承，他者未必能解讀。誠如徐永祚所言，關於會計之制度，中國向無專書，僅憑口頭傳授，加之商界派別之多，法則之亂，為人詬病。（徐永祚，《改良中式簿記概說》，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2009，頁1）筆者以為，要想深入了解明清時期商人的經營、資本、金融與組織等商業機能，就必須對其內部經營的一手資料加以重視，對其進行搜集、整理及研究。本書恰恰就是運用華商經營帳簿進行實證研究的一部學術著作。

許紫芬的研究着眼於地域性商人，從這些商人的經營資料着手，進行企業史和經營史的研究，這種研究特點在本書中反映得淋漓盡致。

第一章幕末開港與華商的進出。長崎的華商團體大致有三江幫、泉漳幫、福州幫和廣東幫。明治時期，隨着日中通商章程的簽訂，日本貿易各港的華商組織多以公所、會館的形式存在。長崎地區有廣東會所、三江會所、三山公所及福建會館。明治年間日本進行國策型產業開發，在開拓使的主導下進行運輸、匯兌及產銷等業務，然而兩次展開對華直銷均以失敗告終。為爭取商權，日本商人團結起來與華商抗衡，迫使華商在秤重等一系列問題上作出妥協。之後，日本政府更是組織對中國商情的實地考察，針對市場狀況設立「日本昆布會社」，將產、購、運、銷等環節融為一體，實現產品直銷。華商則利用貸款等手段將該會社分化瓦解，致其破產。20世紀初，日中國際關係也對兩國貿易產生了直接影響。

第二章廈門商家「泰益號」的經營形態。傳統日本的對華貿易中，海產品極其重要。華商依靠商業才能和活動網路控制了長崎的海產品出口，他們

選出總代表以會館的形態進行自治，泰益號的陳氏家族就是華商代表。作者從《結彩豐盈》帳簿入手，緊扣日本政府外貿政策變化及日華商人力量消長對比，對泰益號的創業、確立、鼎盛、營業再編和衰退五個時期分別進行分析。經營形態方面，陳氏屬家族獨資企業，從《家族支出明細表》可以看出其組織結構，《各費總簿》提供企業職員規模、薪資及福利待遇的資訊，《配置查存》和《進出口明細表》則能夠了解泰益號的商品類型及商圈。泰益號通過向銀行、友人借款獲取運營資金，其資金投入合謀盈利、有價證券、定期存款及不動產進行增殖。

第三章福州商家「生泰號」的經營形態。生泰號是經營海產品的著名商號，由福州府船員出身的陳尚智所創，規模及商圈均頗大。生泰號屬家族企業，其資金來源主要有兩個：親友借款和民間標會。除家族成員外，雇員多數為同鄉或親戚，除薪資、飲食外，還提供獎金。在營業成績分析方面，作者將人名簿、各地域的進貨、銷貨總帳綜合起來製作成「販賣網路與金額表」，使各地營業資料一目了然，商圈及貿易能力也體現於斯。年度利潤計算也用同樣的方法，選取相關年度總帳，統計出收入、支出和純益數額，生成「年度收支結帳表」。可以說，在如何利用不同帳簿進行資料利用與分析方面，本章給提供了很好的範例。

第四章「泰益號」帳簿的實例研究。自1907年以後，泰益號有兩個重要變化：股東結構改為獨資企業；引進了較為完善的會計制度。本章就是圍繞1907年度帳簿的分析而展開的，本年度泰益號帳簿的分類，包括了序時帳冊、總分類帳和結帳簿，結構非常完整。序時帳冊中還設置有購貨簿、銷貨簿和現金簿等特種日記簿。從購、銷貨簿這兩種特種日記簿中所記載的客戶資訊，可獲知泰益號的商業網絡，現金簿則有《外櫃暫登》與《銀行查存》兩種，由此商家可以隨時知曉現金收付總數。應當指出的是，特種日記簿的設置和命名並無定式，乃依商號之業務往來而定，因此，通過觀察特種日記簿的名稱和設置種類，可直觀地了解該商號的業務狀況。再看泰益號的總分類帳，其中設置有明細分類帳。所謂明細分類帳，是商號為了翻檢和過帳的便利，將某些大宗同種性質的帳戶從分類帳中分離出來而專門設置的補助分類帳。明細分類帳的設置與命名也無定式，依據其交易狀況而設。從泰益號分類帳的情況看，其明細帳是按照交易性質、相關貨物、進出口貿易客戶交易和商品性質等大類來設置的。最後為結帳簿，包含了損益表和資產負債表。從上述帳簿的結構看，泰益號的帳法已經具備了現代意義的會計規範。作者認為，「不管是西洋的對資本作動態的計算，或是中國對資產作動態的

計算，兩者均是屬於兩重簿記體系中的簿記法，計算上的分類與綜合是相同的」。(頁135)就內容而言，本章應當是全書最具學術價值的部份，通過泰益號帳簿實例分析，呈現了一個近代商號完整的商業會計業務及流程。然而，筆者以為本章在結構方面卻有不甚合理之處。首先，作者把「中國簿記的記帳原理」置於第二節「泰益號帳簿的結構分析」之下，不僅切斷了前後的行文邏輯，更與該節主題不符，若能提出來置於章首作為導言，想必效果會好一些。此外，第一部份與第二部份有頗多內容重複之處，可以省併。最後一節中的損益表和資產負債表，可以挪到第二節「泰益號帳簿的結構分析」中來與日記簿、分類帳並列，這樣同質性會更強。

第五章生泰號帳簿實例研究。徐永祚在《改良中式簿記概說》一書中曾明確指出，中式帳簿的設置雜亂無章，既不規律，也無系統與秩序。這一情況在後來似乎得到改善，據日本學者戶田義郎的考察，二戰前後中國商家的簿記已經有了基本架構，生泰號的帳簿就呈現出了一定的系統性，其名目雖繁多，卻基本遵循「日記簿過帳至分類帳」這一會計程式。無論是日記帳還是總帳，記錄都非常詳細，通過總帳中的賒欠帳戶資訊可以知悉其營業動態及涉及區域。作者對生泰號帳簿進行了實例分析，《川流》、《現市》為現金簿，二者記錄匯總至《日清》，統計出每日收支，依四柱賬的方式計算結存金額。

第六章中國式收付簿記法的本質。作者引出高寺貞男關於企業資本二重運動的理論，指出資本與資產具有恆常式的均衡關係。借貸簿記法的原理就是基於資產、資本和收益費用增減三者之間的恆等關係。中國傳統收付簿記法的原理與此相同，只是在形式上不一樣。作者指出，中式收付簿記法和西洋借貸簿記有會計分類上的同質性。結合收付式簿記的構造及分錄、轉帳的方法，作者進一步指出，在西方借貸簿記法傳入的清末民初，東方已有複式簿記本質的記帳法存在。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郭道揚關於中國在清代就已經有成熟的複式記帳法的觀點。

通覽全書，可以看出作者具備扎實的會計學功底及縝密的歷史學邏輯，在實例研究的基礎上重點研究中國式收付簿記法的本質，闡明其在世界簿記體系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與所完成的歷史性任務。作者通過研究「泰益號」、「生泰號」的經營帳簿，論述長崎華商的經營實態與貿易手段，從微觀的角度重構了福建商人的具體實像。本書指出，晚晴時期這些活躍於東亞、東南亞的華商，已經發展出了會計學上的複式簿記水準，有力地反駁了學界長期存在的「中國簿記後進性」的通論。從這些意義上講，本書可以說

是會計史研究的一大力作，對於家族企業史、經營史及社會經濟史等方向的研究都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其研究方法與路徑也為商業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曾旭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張亮，《南海回村：三亞回族的空間觀念與社會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85頁。

《南海回村：三亞回族的空間觀念與社會實踐》是以作者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加以修改而成。此書雖篇幅不長，且作者張亮一再在後記中貶損自己的研究，但絲毫不影響這本書該有的學術價值。

在緒言和「經驗與理論」部份，帶着一雙獨有的民族志之「眼」，喜歡從社會事實出發來理解行動者的實踐及其更大範疇社會意義的張亮，主要圍繞三亞回族的時空觀念、社區建設、經濟生活、宗教社生活與身份認同五個方面來探究三亞回族的基本特徵。其中，他對海內外學者的中國回族研究及中國社會個體化理論有自身獨特的認知，既沒有陷入杜磊創設的「建構主義」陷阱，更對「個體化」理論有一種「回應」自覺。

在第一部份的歷史梳理中，他嫻熟運用田野調查獲取的民間歷史故事、碑刻材料、考古材料和族譜等各種形式的資料，參照「回輝話」的語言學研究成果，重新梳理了三亞回族的基本歷史記憶及其認知。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文字材料和口傳資料都顯示三亞回族是從越南占城飄海而來的「番客」。身為人類學者，他敏感地抓住中國民族政策與三亞回族族群身份定位的相互關係問題，借助文獻與口述材料，指出三亞回族不僅不迴避「番客」的身份，還會對眾多的採訪者「建構」這套歷史記憶。自19世紀80年代接受「中國血統研究會」進行體質研究迄今，三亞回族群體已經接受了很多的外來研究者，因此對自身所處時空及族群歷史的表述，顯得應對從容。

作為信仰伊斯蘭教的群體，三亞回族同樣通過積極承認並融入「回族」這一民族分類體系來彰顯自身的國家與民族認同策略。張亮對此總結說，三亞回族在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後，已經形成一種族群自我認同的能動邏輯，這種邏輯伴隨着其社會發展的始終。在他看來，三亞回族的時空觀念不僅需